

陶磁路

著譯 男慈 次念 宋三



中國陶磁器輸往西方和南洋的海上通路，是輻射中華文化光芒的大動脈之一，與陸路上的絲路前後媲美。

當代研究中國古陶磁的大家三上次男博士，是在德國偉大地理學者李希霍芬給絲路命名之後，又給這條海上輸送陶磁的大動脈，命名為「陶磁路」的人，中國的文化永垂不朽，因三上博士的偉大發現和研究，而益為發揚光大。

本書分章敘述中國古陶磁在北非、中東和南洋各國被發現暨珍藏的現狀。為唯一介紹我國陶磁流落海外情況的專書，兼具考古價值。

陶磁路

藝術家叢刊(13)

有成書業公司

\$30.00

陶磁路

三上次男著
宋念慈譯



藝術家叢刊 ⑭

陶磁路

三上次男著

宋念慈譯

發行人 / 何政廣

出版者 / 藝術家出版社

地址 /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118巷5號三樓

電話 / 3719693

總經銷 / 藝術圖書公司

地址 / 台北市溫州街129號四樓

電話 / 3210578

郵撥帳號 / 1762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定價新台幣120元

出版日期：一九八〇年二月一日

譯者序

我中華民族有幾項重大發明，在世界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輝紀錄，同時也給人類的精神和物質生活兩方面，都增進了幸福。

第一是蠶絲的發明，據傳它起源於黃帝妃西陵氏嫫祖，它給上古人在衣着方面，提供了最舒適和最華貴的裝身之具。第二是指南針（羅盤針），據史書的記載，最初見之於黃帝驅逐蚩尤之戰，為時最古，當今無論航空航海，都必須利賴。第三為火藥，它是開山採礦的利器，亦為國防上的必要物資。第四是造紙及印刷術的發明。造紙及印刷為傳播文化的有力工具，今天教育的普及，大半都應歸功於它。第五是陶瓷器的發明與製造，它是與民生最為密切的發明，不僅在實用方面為人所必需，還逐漸在精神生活方面為人所欣賞。

陶器的製作，我國與許多民族國家相同，起源甚早，依據發掘的資料，顯示新石器時代的中國人，已懂得製陶的技術，並且製作得非常精巧，從甘肅出土的有彩陶罐，河南滎池縣仰韶村曾出土彩陶器，河南秦王寨曾出土彩陶鉢，山東歷城縣龍山鎮曾出土城子崖陶鼎和陶鬲等黑陶，這些在歷史考古上都可稱得起是極為珍貴的史料。有釉的陶器可說是原始的瓷器，隨時代的進展，幾經蛻變，到隋朝終於出現了真正的瓷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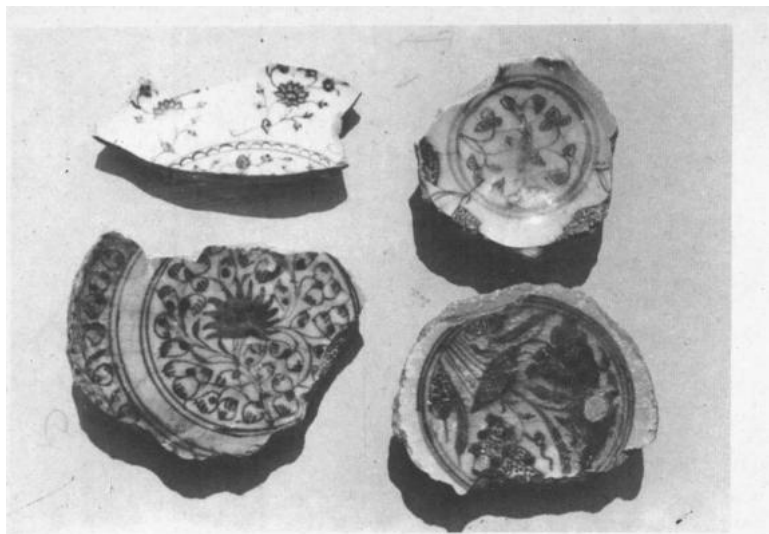
以上這五種偉大的發明，正反映着中華民族的精神和物質文明，日趨達到高度化與藝術化。這些文明的產物不僅能滿足人類生活上的需要，還引發了人們愛美的慾望，所以有些是經過戰爭的過程而外流，有時像絲繒綵緞之屬，竟成了游牧民族掠奪的對象。至如與我漢代同一時代的波斯與東羅馬帝國，國勢強盛，正如日中天，生活豪華，官民競以奢妍相尚，對於中國之絲絹，異常珍視。惟以路遠難致，故有時竟不惜聯合友邦，採取遠交近攻政策，以期打通道路，而藉以取得蠶絲，東西交通在種種努力因素下，得以維持暢通，這條由西安及安西出發經新疆天山南北路，中亞而抵達大秦的陸上交通線，有時為政治和軍事上所使用，後來竟演變成運輸絲絹的通道，十九世紀德國的大地質學家李希霍芬還把這條道路稱做「絲路」。

中國的陶器發明發展之後，同樣為世界各國所喜愛。自六朝至唐代，為佛教的極盛時代，故許多的優美作品之中，除了食器之外，如佛像、唐三彩罐、黃綠釉陶馬、車輿、杯、盤、家畜、駱駝、戰士、官員、歌舞女、樂工、盆、罐、碗等，應有盡有，反映着當時中國社會生活的富裕與浪漫氣息。此等陶磁如駿馬和駱駝、歌舞女、樂工等，大都模倣當時社會所最喜愛的大宛馬、波斯歌女樂工的形像，毫無疑義，這些作品之所以能流落外邦，一方面當然是出於中國商賈的販賣，另方面也是由於各國商賈所購求。這由埃及首都開羅附近所發現的驚人數量的中國陶器，令人想像中國的中世陶磁，當時該是怎樣的為阿拉伯世界所喜愛。

不過由外國所發現的中國陶瓷，當然大部分係經由貿易而來，但有許多名貴之品，如現度藏於伊朗、土耳其、埃及等地知名博物館的瓷器，內中自然也有由中國政府餽贈給外國君主貴人之禮品。許多珍貴陶瓷被君主貴人豪富之輩所收藏，有時是因為它們具有高度的使用價值，所謂美味不如美器，但泰半也是因為欣賞其美術價值，因而纔把它視如拱璧。

我們若從貿易觀點對陶瓷的傳播加以追蹤，殆即可瞭解中國與亞洲諸地區及地中海世界的貿易狀況，這祇是所謂東西關係的一面。若更進一步看，便可發現中國陶瓷所給與各個接受它的國家在精神方面，諸如工藝技術上的刺激，以及在美術方面的影響，則較前者所受的影響為尤深。這當然是有關東西文化交流的問題了。

關於東西文化交流的問題，本書著者並不完全同意十九世紀末，先由歐洲學者所提起，旋由日本學者所附和的說法。人們多以為問題既首先由歐洲學者所提出，因此便必然是西方文化對東方具有壓倒性的影響，或可以說那也就是西洋文物之東漸，其實這無非是由於在近世東西世界政治力量的比較中，西方文化東流的程度，一時稍佔優勢而已。然而本書作者認為文化主流決非經常祇「由西向東」，他認為縱令因時代之變遷，文化流向有強弱之差，但雙方文化與物資的流動，也不會是片面流通，而是互相交錯的，從這裏便造出了普世都可通用的一種時代特徵。從古代到中世的中國絲織物貿易，和中世以後的陶



哈馬出土的中國元代磁器片

磁器貿易，即為顯示文物自東向西流動的適切例證。兩者的西傳，在時間上雖有先後，然磁器；藝術價值，或竟凌絲綢而上之。

關於研究古代和中世的東西關係與貿易方面，若僅倚靠研究貿易路線和貿易品目，仍不能完全了解貿易問題的歷史意義，考古學上資料之活用，在這方面就比較方便而合適。可是在考古方面所得到的資料，假如在質量雙方尚無充分之發現，也很難達成目的。儘管中國古絲綢富有聲譽，然作為遺物留給後世者極為稀少，因之也無法派上用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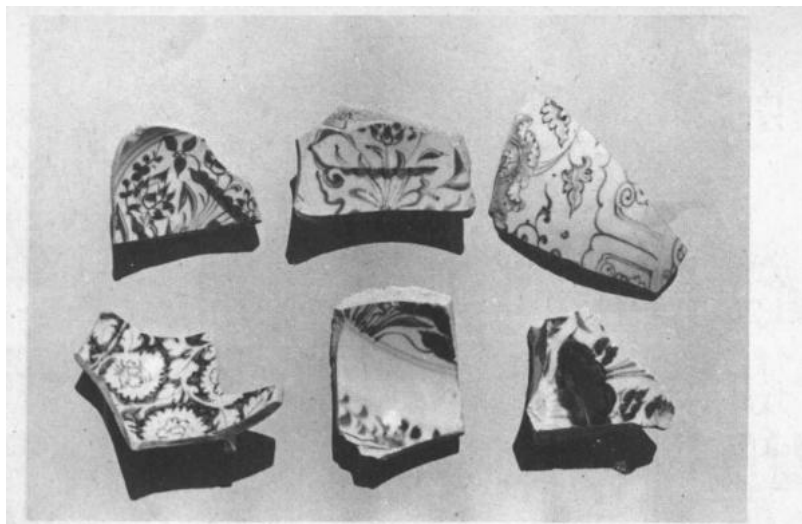
關於這一點，陶磁器雖壞而不朽，在遺跡中仍保持原形，故可成為極可貴的資料，但如此種陶磁器資料發現的數量極少，則也無法掌握其全般的性質，因而稍形貶損其價值。本書即在闡述中國古代陶磁（完整的與不完整的）散播世界各地的情形。

三上先生為了研究中國古陶磁的產銷種類，擴展情形，藝術價值，以及貿易年代之幅度，和它所給予輸出對象各國社會與文化的影響等項，曾在中東各國，東非北非和南洋各國，印度等地，作過廣泛的研究旅行，就中在開羅附近的福斯塔特地方所發現的中國古陶磁破片尤其是元代青花最為豐富，這種質量兩方均屬卓越，而價值又極為高昂的製品，何以竟能在這遠隔重洋之處發現，這證明着當時的開羅市民，如不是相當富有，便是愛好珍奇，不然便是愛好中國製品，或因中國陶磁的利用價值極高，方能有如此鉅量的輸入。以上各點必居其中之一，

或者竟係上列各種原因兼而有之的結果。

當人們在中東和埃及看到了驚人數量的中國古代陶磁，一定會聯想到先民究竟使用什麼方法，把它們運到遙遠的中東地帶。毫無疑義，一般都會說絲路是連結東西亞與地中海世界的貿易路線。因為那是一條由中國經中央亞細亞沙漠、綠洲和草原地帶，以及高山峻嶺而抵達波斯，然後再通往地中海海岸的貿易通路。這條被人習稱為絲路的交通路線，從歷史上看，可說是時斷時續，一方面是由於政治或軍事上的關係，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山川砂磧的險阻，困難較多，但說者總容易陷入唯有它纔是自古代到中世。東西貿易主要通道的錯覺。可是據三上先生的意見，實際上頻繁使用這條道路者，乃在七、八世紀之時，至八、九世紀以後，海上交通道路，勿寧已成為東西貿易的中心路線。中國陶磁之輸出，俄然轉為興盛，的確始自唐末。但連絡東西方的海上貿易路線，事實上在公元一世紀前後，即已為航海者所經常使用了。這是可從紀錄和考古學上所得的資料加以證明，即海路與絲路一樣，早已為東西方重要的貿易道路了。

我們再從東西交通史方面看，也可證明自九—十世紀時期起，海上貿易更呈現了爆發性的發展，來自阿拉伯和印度等地的大船，舳艫相接，大都以廣州、泉州、明州（寧波）、杭州等港為目的地，收購物資西歸，中國可載千人的巨大艦隊還會幾度遠征南洋各島和波斯灣沿岸港口。這類船舶的發展，對於在



福斯塔特遺跡發現的中國磁片

運輸上較易破損又屬笨重的陶磁器之裝運，極為相宜而又容易。因為海運較諸陸上運輸具有許多方便，故可說自九世紀之後，不獨我國輸往西方的磁器，絕大多數均改為海運，即以往須遵循「絲路」運往西方之絲織品，恐均已改採運送陶磁器之海路矣。

這種負有連繫東西方文化橋樑任務的海上交通線，隨時代之進展，其重要性日益顯著。三上先生認為繼絲路而負起運送陶磁前往兩方的海上交通線，實為幅射中華文化光芒的海上大動脈。也是担负東西文化交流的橋樑，他把這條交通線命名為「陶磁路」，實可當之無愧。

本書為三上先生親歷各地發掘遺跡，實地考察研究之紀錄，內容翔實，議論精闢，讀者得此一篇，或可略窺中華文化西傳之深之廣，其影響人類之文明進步，實至深且鉅，即純從欣賞研究中華陶磁藝術或東西交通、文化交流而言，亦殊有其獨特之價值，譯述既畢，特為之序。

本譯稿屢承留日研究之謝明良先生的鼓勵與慫恿，並承藝術家雜誌社發行人何政廣先生之協助，方得出版，在此順表衷心感激之忱。

宋念慈

民國六十九年元月五日

陶磁路

三上次男著
宋念慈譯

譯者序

我中華民族有幾項重大發明，在世界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輝紀錄，同時也給人類的精神和物質生活兩方面，都增進了幸福。

第一是蠶絲的發明，據傳它起源於黃帝妃西陵氏嫫祖，它給上古人在衣着方面，提供了最舒適和最華貴的裝身之具。第二是指南針（羅盤針），據史書的記載，最初見之於黃帝驅逐蚩尤之戰，為時最古，當今無論航空航海，都必須利賴。第三為火藥，它是開山採礦的利器，亦為國防上的必要物資。第四是造紙及印刷術的發明。造紙及印刷為傳播文化的有力工具，今天教育的普及，大半都應歸功於它。第五是陶瓷器的發明與製造，它是與民生最為密切的發明，不僅在實用方面為人所必需，還逐漸在精神生活方面為人所欣賞。

陶器的製作，我國與許多民族國家相同，起源甚早，依據發掘的資料，顯示新石器時代的中國人，已懂得製陶的技術，並且製作得非常精巧，從甘肅出土的有彩陶罐，河南滎池縣仰韶村曾出土彩陶器，河南秦王寨曾出土彩陶鉢，山東歷城縣龍山鎮曾出土城子崖陶鼎和陶鬲等黑陶，這些在歷史考古上都可稱得起是極為珍貴的史料。有釉的陶器可說是原始的瓷器，隨時代的進展，幾經蛻變，到隋朝終於出現了真正的瓷器。

以上這五種偉大的發明，正反映着中華民族的精神和物質文明，日趨達到高度化與藝術化。這些文明的產物不僅能滿足人類生活上的需要，還引發了人們愛美的慾望，所以有些是經過戰爭的過程而外流，有時像絲繒綵緞之屬，竟成了游牧民族掠奪的對象。至如與我漢代同一時代的波斯與東羅馬帝國，國勢強盛，正如日中天，生活豪華，官民競以奢妍相尚，對於中國之絲絹，異常珍視。惟以路遠難致，故有時竟不惜聯合友邦，採取遠交近攻政策，以期打通道路，而藉以取得蠶絲，東西交通在種種努力因素下，得以維持暢通，這條由西安及安西出發經新疆天山南北路，中亞而抵達大秦的陸上交通線，有時為政治和軍事上所使用，後來竟演變成運輸絲絹的通道，十九世紀德國的大地質學家李希霍芬還把這條道路稱做「絲路」。

中國的陶器發明發展之後，同樣為世界各國所喜愛。自六朝至唐代，為佛教的極盛時代，故許多的優美作品之中，除了食器之外，如佛像、唐三彩罐、黃綠釉陶馬、車輿、杯、盤、家畜、駱駝、戰士、官員、歌舞女、樂工、盆、罐、碗等，應有盡有，反映着當時中國社會生活的富裕與浪漫氣息。此等陶磁如駿馬和駱駝、歌舞女、樂工等，大都模倣當時社會所最喜愛的大宛馬、波斯歌女樂工的形像，毫無疑義，這些作品之所以能流落外邦，一方面當然是出於中國商賈的販賣，另方面也是由於各國商賈所購求。這由埃及首都開羅附近所發現的驚人數量的中國陶器，令人想像中國的中世陶磁，當時該是怎樣的為阿拉伯世界所喜愛。

不過由外國所發現的中國陶瓷，當然大部分係經由貿易而來，但有許多名貴之品，如現度藏於伊朗、土耳其、埃及等地知名博物館的瓷器，內中自然也有由中國政府餽贈給外國君主貴人之禮品。許多珍貴陶瓷被君主貴人豪富之輩所收藏，有時是因為它們具有高度的使用價值，所謂美味不如美器，但泰半也是因為欣賞其美術價值，因而纔把它視如拱璧。

我們若從貿易觀點對陶瓷的傳播加以追蹤，殆即可瞭解中國與亞洲諸地區及地中海世界的貿易狀況，這祇是所謂東西關係的一面。若更進一步看，便可發現中國陶瓷所給與各個接受它的國家在精神方面，諸如工藝技術上的刺激，以及在美術方面的影響，則較前者所受的影響為尤深。這當然是有關東西文化交流的問題了。

關於東西文化交流的問題，本書著者並不完全同意十九世紀末，先由歐洲學者所提起，旋由日本學者所附和的說法。人們多以為問題既首先由歐洲學者所提出，因此便必然是西方文化對東方具有壓倒性的影響，或可以說那也就是西洋文物之東漸，其實這無非是由於在近世東西世界政治力量的比較中，西方文化東流的程度，一時稍佔優勢而已。然而本書作者認為文化主流決非經常祇「由西向東」，他認為縱令因時代之變遷，文化流向有強弱之差，但雙方文化與物資的流動，也不會是片面流通，而是互相交錯的，從這裏便造出了普世都可通用的一種時代特徵。從古代到中世的中國絲織物貿易，和中世以後的陶



哈馬出土的中國元代磁器片

磁器貿易，即為顯示文物自東向西流動的適切例證。兩者的西傳，在時間上雖有先後，然磁器；藝術價值，或竟凌絲綢而上之。

關於研究古代和中世的東西關係與貿易方面，若僅倚靠研究貿易路線和貿易品目，仍不能完全了解貿易問題的歷史意義，考古學上資料之活用，在這方面就比較方便而合適。可是在考古方面所得到的資料，假如在質量雙方尚無充分之發現，也很難達成目的。儘管中國古絲綢富有聲譽，然作為遺物留給後世者極為稀少，因之也無法派上用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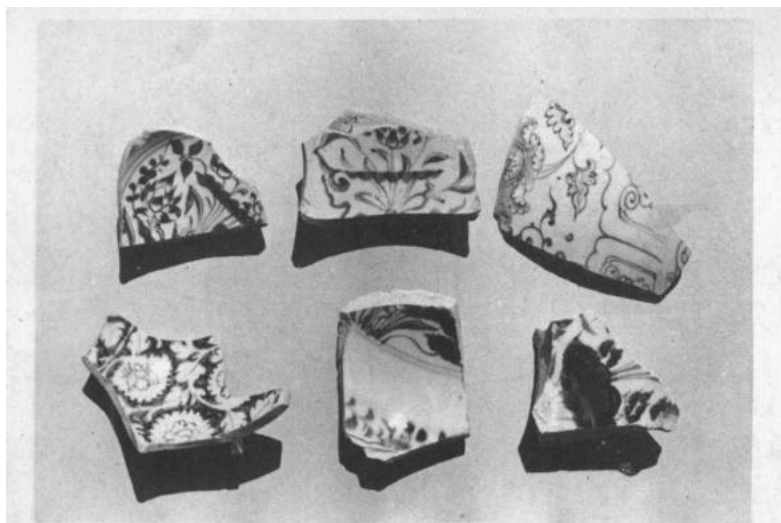
關於這一點，陶磁器雖壞而不朽，在遺跡中仍保持原形，故可成為極可貴的資料，但如此種陶磁器資料發現的數量極少，則也無法掌握其全般的性質，因而稍形貶損其價值。本書即在闡述中國古代陶磁（完整的與不完整的）散播世界各地的情形。

三上先生爲了研究中國古陶磁的產銷種類，擴展情形，藝術價值，以及貿易年代之幅度，和它所給予輸出對象各國社會與文化的影響等項，曾在中東各國，東非北非和南洋各國，印度等地，作過廣泛的研究旅行，就中在開羅附近的福斯塔特地方所發現的中國古陶磁破片尤其是元代青花最爲豐富，這種質量兩方均屬卓越，而價值又極爲高昂的製品，何以竟能在這遠隔重洋之處發現，這證明着當時的開羅市民，如不是相當富有，便是愛好珍奇，不然便是愛好中國製品，或因中國陶磁的利用價值極高，方能是如此鉅量的輸入。以上各點必居其中之一，

或者竟係上列各種原因兼而有之的結果。

當人們在中東和埃及看到了驚人數量的中國古代陶磁，一定會聯想到先民究竟使用什麼方法，把它們運到遙遠的中東地帶。毫無疑義，一般都會說絲路是連結東西亞與地中海世界的貿易路線。因為那是一條由中國經中央亞細亞沙漠、綠洲和草原地帶，以及高山峻嶺而抵達波斯，然後再通往地中海海岸的貿易通路。這條被人習稱為絲路的交通路線，從歷史上看，可說是時斷時續，一方面是由於政治或軍事上的關係，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山川砂磧的險阻，困難較多，但說者總容易陷入唯有它纔是自古代到中世。東西貿易主要通道的錯覺。可是據三上先生的意見，實際上頻繁使用這條道路者，乃在七、八世紀之時，至八、九世紀以後，海上交通道路，勿寧已成為東西貿易的中心路線。中國陶磁之輸出，俄然轉為興盛，的確始自唐末。但連絡東西方的海上貿易路線，事實上在公元一世紀前後，即已為航海者所經常使用了。這是可從紀錄和考古學上所得的資料加以證明，即海路與絲路一樣，早已為東西方重要的貿易道路了。

我們再從東西交通史方面看，也可證明自九—十世紀時期起，海上貿易更呈現了爆發性的發展，來自阿拉伯和印度等地的大船，舳艫相接，大都以廣州、泉州、明州（寧波），杭州等港為目的地，收購物資西歸，中國可載千人的巨大艦隊還會幾度遠征南洋各島和波斯灣沿岸港口。這類船舶的發展，對於在



福斯塔特遺跡發現的中國磁片

運輸上較易破損又屬笨重的陶磁器之裝運，極為相宜而又容易。因為海運較諸陸上運輸具有許多方便，故可說自九世紀之後，不獨我國輸往西方的磁器，絕大多數均改為海運，即以往須遵循「絲路」運往西方之絲織品，恐均已改採運送陶磁器之海路矣。

這種負有連繫東西方文化橋樑任務的海上交通線，隨時代之進展，其重要性日益顯著。三上先生認為繼絲路而負起運送陶磁前往兩方的海上交通線，實為幅射中華文化光芒的海上大動脈。也是担負東西文化交流的橋樑，他把這條交通線命名為「陶磁路」，實可當之無愧。

本書為三上先生親歷各地發掘遺跡，實地考察研究之紀錄，內容翔實，議論精闢，讀者得此一篇，或可略窺中華文化西傳之深之廣，其影響人類之文明進步，實至深且鉅，即純從欣賞研究中華陶磁藝術或東西交通、文化交流而言，亦殊有其獨特之價值，譯述既畢，特為之序。

本譯稿屢承留日研究之謝明良先生的鼓勵與慫恿，並承藝術家雜誌社發行人何政廣先生之協助，方得出版，在此順表衷心感激之忱。

宋念慈

民國六十九年元月五日